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高　　頡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治系博士生)

摘　要

當前中國的政體類型為何？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裡，中國的位置在那裡？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國表現出那些整體的政權特性？相較於毛澤東時期，那些特性出現變化、那些則延續下來？本文將以 Juan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的分類為基礎，在不捨棄原始分類中任何一個分類標準的前提下，修正成一個結合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分析框架。接著，再根據這個分析框架帶入相應的研究議題，透過大量的二手文獻，歸納整理出對當前中國政體性質的總體評估。

藉由評析近 150 筆專書、文章、專章等文獻，本文主張當前中國揉合了前蘇東共黨國家之後極權特性（政治、社會領域）及台灣威權統治時期之典型威權特性（經濟領域）。因此，在非民主政體分類的概念系譜當中，中國既非完全的後極權主義，也不是 1970~1980 年代典型威權主義的再現，而是同時混合兩者核心特徵的非民主政體，表現出「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這個現象表示在脫離毛澤東統治的過程中，中國在「政經社」三個領域出現不同的偏離幅度，即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而在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

本文的研究發現提供三個研究議程。第一、未來學界應該探討是什麼因素造成中國政體出現混合特性？執政黨又是如何成為揉合這種特性的重要機制？第二、中國政體的混合性質可以為非民主政體的分類帶來重要啟示，學界應該重視長期被忽略的經濟因素對政體分類可能的影響力。第三、未來學界應該透過對少量個案的比較研究，一方面給予後極權主義明確的定義，另一方面釐清後極權主義及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概念邊界。

關鍵詞：中國、政體類型、威權政體、後極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

*　*　*

* 本文爲碩士論文改寫，指導教授爲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寇健文教授。原題爲「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權性質的探討」，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審核通過。

壹、前　言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當前中國的政體類型爲何？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中，中國的位置在何處？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表現出那些整體特徵？在脫離毛澤東統治之後，那些政權特性出現變化、那些則延續下來？爲了回答這幾個看似不同、實則密切相關的問題，本文將以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後文簡稱 L&S）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爲基礎，①根據該分析框架帶入相應的議題，透過近 150 筆的專書、文章、專章等二手文獻，歸納整理出對當前中國政體的總體性評估。

在現有文獻當中，針對這個研究問題已經累積出至少四種論點。第一、極權主義文獻：這類文獻雖然同意中國因爲改革出現變遷，但認爲其仍保持毛澤東時期的重要核心特徵（例如馬列主義的絕對正確性、意識形態目標與一黨專政），後毛時期的改變僅觸及政體運作的方法，而非核心的規範原則，仍未脫離極權主義範疇。②第二、威權主義文獻：這類文獻若不是直接將中國稱爲威權主義，就是在威權主義前方加上形容詞。前者認爲中國因爲政治繼承的制度化、菁英功績制任命的確立和制度的多元化，而從極權主義轉變到典型威權主義；③後者則是學者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後，提出的概念產品。④

第三、後極權主義文獻：這類文獻主要以台灣學者爲主，認爲後毛時期雖然已經不同於極權主義，但還是不同於未曾經歷極權統治的典型威權主義，因此按照 L&S 的定義，當前中國應該是既非極權也非典型威權的後極權。⑤第四、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

註①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② Sujian Guo, *Post-Mao China: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Authoritarianism?*（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註③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January 2003）, pp. 6~17.

註④ 例如以「分裂式威權主義」描繪中國複雜的官僚議價關係、以「分權式威權主義」解釋中央如何控制地方幹部、以「可接受的威權主義」解釋中國如何讓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民願意容忍、接受一黨專政、以「革命式威權主義」說明當前中國的國家行爲者仍沿用革命時期的手段來延續政權。參見：Kenneth Lieberthal,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 in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ao China*（California,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30; Pierre Landr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eresa Wright,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lizabeth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7（January 2007）, pp. 1~22.

註⑤ 趙建民，**威權政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林佳龍，「比較兩岸的政體轉型：台灣民主化對中國的啓示」，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頁 25~66；林佳龍、徐斯勤，「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11~20。

型國家文獻：吳玉山是這類文獻的代表性學者，他歸納整理學者的研究結果，提出「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認爲中國一方面出現前蘇東共黨國家的後極權特徵，另一方面也展現東亞發展型國家特徵；⑥蕭功秦則是另一個例子，他提出的「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的新權威政治模式」，在概念內涵上與吳玉山的觀點一致。⑦

本文認爲，這四種論點雖然均有助於從不同角度理解中國政體，卻沒有任一論點提供滿意的答案。極權主義文獻無法點出後毛時期中國的動態變遷過程。威權主義文獻忽略中國曾經歷一段統治嚴密的極權時期，無法區分出中國與一般威權國家之間的差異；至於帶有形容詞的威權主義，最多只能點出政體的局部特徵，無法提供一個整體性的圖像。後極權主義文獻雖然點出了中國曾經過一段極權統治的時期，但其本身的概念定義不夠精確，甚至沒有學者眞正說清楚後極權主義和其他非民主政體相關概念的差別及概念邊界；此外，他們的觀點均爲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有必要重新檢視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文獻的問題在於，該概念源自〈黨國蛻變〉最後一章裡，吳玉山根據書中其他學者的研究而總結出的論點，這雖是不簡單的工作，但能涉及的面向和議題畢竟有限；此外，該論點也沒有直接與非民主政體分類的概念系譜對話，與本文有所不同。

藉由評析近 150 筆專書、文章、專章等文獻，本文主張當前中國在政治、社會領域貼近後史達林蘇東國家的後極權特性，在經濟領域上則貼近台灣在兩蔣、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典型威權主義特性，因此在非民主政體的概念系譜裡，既不是完全的後極權主義，也不是 1970-1980 年代典型威權主義的再現，而是揉合兩者政體類型之核心特徵。⑧這個現象反映出中國在脫離毛澤東統治的過程當中，「政經社」三個領域各自有不同的偏離幅度，即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而在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按此，當前中國屬於混合及含括著後極權和典型威權主義特性的非民主政體，表現出「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

本文分爲六個部分。第二節說明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議題；第三至五節分別探討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最後一節是結論，並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提出三點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研究議程，特別是對非民主政體分類上的啓發。

註⑥ 吳玉山，「觀察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309~335。

註⑦ 蕭功秦，「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戰略與管理**（北京），2002 年第 6 期，頁 82~88。

註⑧ 本文刻意將 Linz 定義的威權主義稱爲「典型威權主義」（例如非民主統治時期的台灣、南韓、西班牙等國家）。這麼做是因爲目前研究非民主國家的學者，多數用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指稱所有的非民主國家，但本文的「典型威權主義」只是所有非民主國家中的一種類型，因此特別加上典型兩字，以便於與威權主義有字義上的區別。

貳、分析框架及研究議題

一、分析框架

本文將以 L&S 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爲基礎，先進行修正以排除在他們原始分類中存在的缺點，在不捨棄任何分類標準的前提下，結合成一個包含「政經社」三個領域的分析框架。接著，在探討個別領域時，本文將帶入各個領域相應的研究議題，透過回顧和評析二手文獻，從學者們對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中，抽離出政體的部份特徵，再歸納整理出一個整體性評估。易言之，本文的立論將以二手文獻、學者的研究成果爲基礎。

綜觀學界對非民主國家的研究，L&S 仍然是最適合的分類框架，主因是其分類標準相當全面，兼論「政經社」因素；其他分類若不是只憑藉單一標準，就是分類標準著重在政治面，看不到經濟、社會面對政體分類的影響。⑨ L&S 按照多元主義、領導權、意識形態和政治動員，將非民主政體區分爲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和蘇丹制共四種不同的類型。本文不會討論較少受到學界重視的蘇丹制，主要聚焦在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⑩

按照 L&S 的觀點，後極權和典型威權在四個面向上展現各自的運作邏輯。

（1）在多元主義方面，他們細分成「政經社」多元主義進行討論。在政治上，後極權不同於極權的一元統治，開始存在因爲制度化而出現的「體制內多元」，但在類型上迴異於典型威權的「有限多元」。在經濟上，後極權雖然因爲引入市場機制而出現多元性，但仍不同於從未拋棄私有制、經濟活動表現出顯著多元性的典型威權主義。在社會上，後極權雖然因爲拋棄過去的一元統治，而出現相對多元性，但這些多元性是國家主導「去極權主義化」的結果，國家雖允許、鼓勵社會的多樣性，但仍會限制之。這種「既鼓勵又限制」的多元性，或稱爲「被管理的多元主義」（managed pluralism），⑪不同於典型威權多半能在敏感政治議題之外，享有非常廣泛的社會多元性。

註⑨　相關例子見：Amos Perlmutter,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arbara Gedd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June 1999）, pp. 115~144; Samuel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3~47;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註⑩　相較於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蘇丹制較少受到學界的使用，缺乏分析效用。關於蘇丹制政體，參見：Houchang Chehabi and Juan Linz, *Sultanistic Regimes*（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⑪　Harley Balzer, “State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China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cy*（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235~256.

（2）在領導權方面，不同於極權統治的不可預測性，後極權在權力行使時出現可預測的限制；另外，不同於極權時期僅重視幹部的政治資歷，後極權的菁英甄補開始重視專業性；但後極權的幹部來源主要來自黨組織和政府系統，而不像典型威權可能來自民間社會。

（3）在意識形態上，後極權仍存在官方意識形態，仍對國家運作產生影響，不同於典型威權只存在一種特殊的思想心態（mentality）；然而不同於極權時期，意識形態不再是統治正當性的主要來源及具備高度烏托邦色彩。

（4）在政治運動上，後極權的動員強度和範圍雖然高於典型威權，但強度上卻較極權時期大幅降低。總之，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確實是必須區分的概念。

然而，雖然 L&S 提出的分類標準最爲廣泛，但分類標準間卻缺乏內聚力，反而模糊了原有的優點。因此，本文在不捨棄任一分類標準的前提下，修正成一個結合「政經社」三個領域的分析框架。在政治領域方面，本文看的是中國**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根據學者的觀點，黨國體制的核心是「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⑫據此，本文將政治領域分爲「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前者包含原始分類中「政治多元主義」、「領導權」、「政治動員」，後者則是原始分類中的「意識形態」。在經濟領域方面，本文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這部份維持原始分類中的「經濟多元主義」不變。在社會領域方面，本文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這個部分則維持「社會多元主義」不變。

二、研究議題

本文按照上述新的分析框架，帶入相應的研究議題。第一、政治領域：在列寧式政黨方面，研究議題包括政治繼承、決策模式、菁英甄補、政治動員共四個議題。本文藉由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的文獻，檢視當前是否出現不同於極權時期的政治多元性。本文再藉由菁英甄補的文獻，觀察當前中共幹部選拔著重的憑證。最後，本文藉由政治動員的文獻檢視當前政治動員的特徵。在意識形態方面，本文鎖定討論中共意識形態之重要性、功能及對其控制的文獻。

第二、經濟領域：本文關注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兩種行爲者—國有企業（部門）和私營企業（部門）—觀察當前國家市場關係的現狀，再將中國經濟的發展放入比較視野，分析當前中國的經濟模式，究竟是趨近後極權時期的蘇東共黨國家，還是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第三、社會領域：文獻包括社會組織、社會抗爭、基層選舉共三個議題。這三個議題是當前學者檢視中國社會多元性時，最普遍討論的議題。⑬總結上述可見表 1。

註⑫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註⑬ 本文認爲中國的基層選舉帶有更顯著的社會意涵（相較於政治意涵），除了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連結，更是社會多元性的展現。如同後文分析，基層選舉使社會上的人民與國家的想法更爲契合；此外，基層選舉對於社會上的人民有授權作用，直接影響其日常、實質生活。

表 1　分析框架與研究議題

分析框架		研究議題
政治領域	列寧式政黨	政治繼承、決策模式、菁英甄補、政治動員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功能與控制
經濟領域		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私營企業改革與發展
社會領域		社會組織、社會抗爭、基層選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參、政治領域：後極權主義特性

一、列寧式政黨

本文藉由歸納整理「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相關文獻後，認爲當前中國在政治領域方面，既不同於極權主義也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而更貼近後極權主義。在列寧式政黨方面，當前中國表現出明顯的後極權特性。

第一、在政治繼承上，部分學者約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指出制度因素對高層菁英權力轉移的影響，認爲高層菁英寄望透過制度來解決權力分配問題，包含以年齡和任期限制的「退休制度」和「梯隊接班」。⑭因此，學者在評估後毛中國的政治繼承時，多數同意政治繼承出現制度化趨勢，主張高層權力轉移的過程中，「正式政治」已經逐漸取代「非正式政治」，⑮菁英的離退受到制度規範，出現可預測的空間。⑯雖然完全的正常政治未實現，但至少是一個「受駕馭的制度主義」。⑰事實上，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權力交替時，已經反映出當前的政治繼承是一段制度安排的過程，強調妥協、共識建立和去人格化。這不但是鄧小平爲了避免權力過度集中，也是江胡希望藉此鞏固權力基礎，彌補他們缺乏領袖魅力的缺憾。⑱因此有學者指出，毛澤東時期贏者全拿的權力競爭已經不符合現狀，當前應該是「權力平衡模式」，制度因素成爲主導菁英政

註⑭　關於退休制度見：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關於梯隊接班，見：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書局，2010 年），頁 269~309。

註⑮　David Bachman,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The China Journal*, No. 45（January 2001）, pp. 95~100.

註⑯　David Shambaugh,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The China Journal*, No. 45（January 2001）, pp. 101~111.

註⑰　Frederick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January 2001）, pp. 69~82.

註⑱　Jing Huang,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80~97.

治的主要力量；此外，政治競爭的結果不再是零和遊戲，而可能產生多位勝利者。⑲

第二、在決策模式上，當前中國也因爲朝向「集體領導、個人分工」而落實政治制度化，藉由各級黨委落實「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透過集體決策和責任分工，限制高層的權力競爭，並創造進行合作和妥協的誘因，企圖消除毛時期不受限制的派系衝突。⑳此外，順應改革開放的需要，決策模式也朝向協商式趨勢，在政策選擇上重視專業資訊與共識，而不受制於意識形態。㉑總之，當前中國的決策過程朝向制度化，限制最高領導人行使專斷決定權的可能，試圖建立常規、可預測的決策模式。

第三、在菁英甄補上，當前中國同樣表現出後極權特性。不同於極權主義，技術官僚的數量和政治地位均大幅增加，已經取代魅力型領袖成爲當前中共的領導核心，㉒可知「專業憑證」對菁英甄補的重要性已顯著提升。㉓不過同時間，黨務官僚還是佔據重要角色，顯示「非專業憑證」的重要性並未完全消失。事實上，當前中國存在兩條甄補管道，一條重視候選人的專業能力，集中在教育、經濟、科技、外貿和銀行體系部門；㉔另一條重視候選人的黨齡和政治憑證，特別是在傳統黨務部門，例如組織、宣

註⑲ Zhiyue Bo, *China's Elite Politic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7）. 然而，部分學者強調制度化趨勢的強化仍然無法掩蓋「非制度因素」在高層菁英政治的重要性，參見：Lowell Dittmer,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January 2001）, pp. 53~67; Joseph Fewsmith, "The New Shape of Elit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January 2001）, pp. 83~93. 不過，這些學者不否認制度化確實出現，只是對於制度化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換言之，這僅是程度而非類別的差異。

註⑳ Alice Mil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Chinese Leadership Politics,"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61~79.

註㉑ David Shambaugh,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pp. 103~106.

註㉒ 關於毛澤東時期（極權主義時期）的高層菁英組成及其特徵，請參見：Robert Scalpino,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attle, DC: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註㉓ Bruce Dickson and Maria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1（February 2000）, pp. 87~112; Yanjie Bian, Xiaoling Shu and John Loga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Social Forces*, Vol. 79, No. 3（March 2001）, pp. 805~841; Hong-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heng Li,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July 1994）, pp. 1~30;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8, No. 3（March 1998）, pp. 231~264.

註㉔ He Li, "Returned Stud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Vol. 30, No. 2（Summer 2006）, pp. 1~29；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28；寇健文、陳方隅，「1978 年以後中共財經高官的仕途流動：特徵與趨勢」，**政治學報**，2009 年第 47 期，頁 59~103。

傳等等。㉕

此外，派系力量和省級工作經歷這些「非專業憑證」，也是幹部選拔的重要考量因素。部分學者發現胡錦濤上任增加團系在中委會和省級領導的任職比例。㉖另有學者則發現優秀的省級領導人更有可能成爲國家領導人，地方各省逐漸成爲未來領導人的鍛鍊場域，㉗例如在胡錦濤時期，當其他條件均相同時，擁有正省部級領導職務歷練的候選人，更有可能進入政治局。㉘最後，中國高層的菁英來源大致上都是依循黨和政府部門的甄補管道，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允許大量的民間社會菁英進入領導高層。㉙這些菁英甄補特徵反映出明顯的後極權特性。

第四、在政治動員上，本文藉由學者對政治動員的統計列表，再加上本文的補充，作爲觀察政治動員變遷趨勢的資料基礎。㉚根據統計結果（見表 2），本文提出四個研究發現：

（1）相較於毛時期，目前全國性動員的次數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自 1950 年代初到 1970 年代末的 30 年間，總共發生 27 次的全國性動員，但接下來從 1980 年代初到 2011 年的 30 年間，總共只發生 5 次的全國性動員。另外，全國性動員的發生頻率也急速下降。在毛時期，若不是同年度發生一次以上的全國性動員，就是發生動員之間的相隔時間絕不超過 3 年，但從 1980 年代開始，每次動員的間隔時間越來越長。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全國性動員並未消失，大規模的政治動員還是會出現，這就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

註㉕　Xiaowei Z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Party Seniority, and Elite Recruit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30, No. 1（March 2001）, pp. 62~75; Xiaowei Zang,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註㉖　Chien-Wen Kou, “The Rise of Youth League Affiliates after 1978 and Their Paths to the Top,”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it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vember 6~7, 2010）, pp. 1~19; Cheng Li, “Hu’s Policy Shift and the Tuanpai’s Coming-of-Ag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5（July 2005）, pp. 8~13.

註㉗　Zhiyue Bo, *China’s Elite Politics: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zation*（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0）, pp. 81~82.

註㉘　Hsin-Hao Huang, “Institutionalizing Political Entry into the CCP Politburo: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nfigurative Comparative Method,”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it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vember 6~7, 2010）, pp. 1~27.

註㉙　例如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國民黨從 1970 年代開始，開始甄補大量來自前政體、民間社會爲主的本土菁英，政治菁英出現「台灣化」和「本土化」的轉型。總之，台灣威權時期曾允許、吸納來自民間、舊政體的本土菁英進入權力核心的現象，與後毛中國有所不同，再次指向當前中國的菁英甄補上反映後極權特性。關於台灣威權時期的菁英甄補，參見吳文程，**台灣的民主轉型：從權威型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台北：時英出版社，1996 年），頁 47~74。

註㉚　Shiping Zheng 列舉 1950 年至 1989 年間的政治動員，胡鞍鋼也列舉 1950 年至 1976 年間的政治動員。本文主要依賴這兩位學者的列表；不過他們的資料最多只統計到 1989 年。爲了解決資料的空缺，本文還會參考〈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補充 1989 年至 2011 年間的資料。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爲了聚焦，只討論全國性、全黨範圍的政治動員，捨棄針對農村或城市及單一領域的運動，但這不表示這些政治動員是不重要的。

（2）政治動員的性質出現改變，從過去的階級鬥爭轉向現在的道德灌輸。在毛時期，政治動員的主要目的是藉由打擊階級敵人，來維持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因此可以看到諸如鎮壓反革命、三反、反右、文化大革命，這些消滅特定階級團體的政治動員。這種目的的動員經常是暴力性的。不過，自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將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現代化，因此除了在 1980 年代看到少數打擊特定階級團體的動員，例如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 1990 年代開始就再也沒有出現暴力性質的動員。相反地，現在的政治動員多半帶有道德灌輸或教育的意義，例如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榮辱觀等等。這種性質的運動不僅是非暴力化的，在內容上也比較空泛，不同於過去那些具有明確政治目標的動員，對社會人民的實質影響非常有限，可能只變成在路邊、車站內的標語（例如文明排隊、文明搭車等等），動員本身的強度及深入社會的程度均不如過去。

表 2　中國的政治動員（1950-2011）

年代	對象	政治動員名稱（年份）	次數
1950s	全國	鎮壓反革命（1950-52）、抗美援朝（1950-53）、三反運動（1951-52）、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1953-54）、學習蘇聯經驗（1953-54）、反胡風運動（1955-56）、反右運動（1957-58）、大躍進（1958-59）	8
	黨組織	整黨整風（1950）、整頓黨的基層組織（1951-54）、整黨整風（1957）、反右傾運動（1959-60）	4
1960s	全國	學雷鋒（1963）、學解放軍（1963）、越戰備戰（1965）、批海瑞罷官（1965）、紅衛兵運動（1966）、文化大革命（1966-69）、活學活用毛澤東主席著作（1966-69）、批陶鑄（1967）、全面奪權（1967）、三軍兩支（1966-72）、反擊二月逆流（1967）、抓叛徒（1967）	12
	黨組織	整黨整風（1962）、整黨整風（1969）	2
1970s	全國	一打三反（1970）、批林批孔（1971-74）、學習無產階級專政（1975）、評水滸宋江（1975）、反右傾翻案風（1975-76）、粉碎四人幫（1976-77）、眞理論戰（1978）	7
	黨組織	整黨整風（1970）、整黨整風（1971）	2
1980s	全國	清除精神污染（1983）、反犯罪運動（1983-84）	2
	黨組織	全面整黨（1983）、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思想整頓（1989）	3
1990s	全國	精神文明建設（1996）	1
	黨組織	整黨整風（1990）、反浪費（1997）、學習鄧小平理論（1998）、三講整風（1998）	4
2000s	全國	道德建設（2001）、社會主義榮辱觀（2006）	2
	黨組織	整風（2001）、貫徹三個代表（2003）、保先運動（2004, 2006, 2011, respectively）、學習科學發展觀（2008）、創先爭優（2011）	5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Shiping Zheng、胡鞍鋼、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後製表而成。Shiping Zhe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70~272；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北京：清華大學，2007 年），頁 741~75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 1921 年 7 月-2011 年 6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當前的政治動員的動員對象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整個社會。在毛時期，政治動員多半是動員無產階級來打擊非無產階級，參與者可以從動員中獲得實質好處，這是政治動員能夠深入社會的主因之一。不過到了 1990 年代以後，動員對象轉變成整個社會群衆。這種失去階級性的政治動員讓行爲者失去參與的誘因，解釋了爲什麼當前的動員無法如過去般的深入社會。

（4）從全黨性質的政治動員來看，組織處理的整黨整風已經很少出現，思想學習成爲動員的主要內容。在毛時期，執政者經常藉由發動政治動員來清除政治敵人，重新整理黨組織和統一思想。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這種組織性處理的政治動員基本上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學習，目的不僅是加強黨幹部的執政能力（例如保先運動、創先爭優），更是鞏固中共統治地位的方式（例如貫徹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學習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㉛

總之，當前中國的政治動員已經不同於毛澤東時期，全國性動員的次數和發生頻率均大幅降低，動員本身也失去深度，轉而變成一種道德勸說和思想學習的儀式性活動；不過，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當前中國還是會出現大規模的全國性動員。可知在政治動員方面，當前中國反映著後極權特性。

二、意識形態

在意識形態方面，當前中國同樣非常貼近後極權特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及人民對其信念已經大幅降低，㉜主因除了是人民於市場經濟中的理性化及其對政體的批評，㉝更是因爲老幹部離退後，年輕領導人並不如老人對社會主義擁有熱情，而且新任領導者爲了經濟發展，也開始裁減黨務部門，減少流向宣傳和審查系統的資源。㉞六四天安門事件更是幾乎摧毀人民對馬列主義僅剩的信仰。㉟因此，中共統治正當性的來源出現轉變，即從意識形態轉變成經濟發展、㊱有效的治理能力、㊲

註㉛　2013 年 6 月習近平推動的「黨的群衆路線教育運動」，同樣符合當前政治運動的特徵，環繞在維持黨員工作的清廉作風，確保黨的先進性。參見「黨的群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求是理論網**，http://www.qstheory.cn/tbzt/tbzt_2013/qzlxjysj/。

註㉜　Gordon White,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in Robert Benewick and Paul Wingrove eds., *China in the 1990s*（London: MacMillan, 1995）, pp. 21~33.

註㉝　Xueliang Ding,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in China: Legitimacy Crisis, 1977-1989*（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註㉞　Geremie Barme,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8~220.

註㉟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2nd edi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

註㊱　Elizabeth Perry, “Chinese Conception of Right: From Mencius to Mao and Now,”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 6, No. 1（March 2008）, pp. 137~147; Vivienne Shue, “Global Imagination, The State’s Quest for Hegemony, and the Pursuit of Phantom Freedom in China,” in Katarina Kinvall and Kristina Jonss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sia*（London: Routlege, 2002）, pp. 210~229.

註㊲　Wenfang Tang and William Parish,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Contras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緒、㊳藉由基層選舉增加人民的政治信任等等。㊴這就完全不同於極權主義的範疇。

然而，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當前官方意識形態仍具有相對明確的目標。㊵意識形態不但不能受到公開質疑，更具有至少兩個現實功能。第一、凡是國家的重要政策制定，都需要意識形態的認可。㊶因此我們經常看到，國家領導人先重新定義意識形態的內涵後，新的重要政策才接著出台。㊷此外學者還指出，目前中國的政策過程中，意識形態還是具有重要性，只是性質和角色出現變化。在過去，政策制定多半是演繹意識形態原理原則的結果，但在改革開放後，意識形態轉變成合理化現實需求的工具，成爲「事後合理化」的工具。㊸

第二、意識形態與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鞏固存在緊密的關係。例如胡錦濤透過「科學發展觀」的口號，奪取在意識形態上的詮釋權，鞏固胡溫領導體制。㊹這間接指向意識形態是政治繼承裡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並非與現實無關。部分學者甚至認爲，意識形態仍是中共維持統治正當性的一個重要因素（雖不是主要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意識形態改革」—延續傳統意識形態，提出「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的新論述—是中共企圖藉由重新定義共同利益，使多數人民堅信自己的利益受到反應，幫助中共維持統治合法性。㊺

事實上，正是由於意識形態仍具有現實功能，吾人仍然可以看到中共堅持意識形態的控制。如同過去，中共的宣傳系統持續發揮控制意識形態的功能，但不同的是它們已大幅降低灌輸馬列思想的改造功能，主要執行促進經濟發展的任務，利用新興媒體、學習西方的傳播技巧，重新包裝中共，有效地鞏固政體穩定。㊻例如，中共藉由電視節目宣傳「晉商精神」，塑造商人的形象，引導人民支持私營企業主。明顯地，宣傳

註㊳ Peter Hays Gries, "Popular Nationalism and State Legitimation in China,"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pp. 180~194.

註㊴ James Kennedy, "Legiti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wo Increases, One Redu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0 (May 2009), pp. 391~395.

註㊵ Sujian Guo, *Post-Mao China: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Authoritarianism?*, pp. 36~43.

註㊶ Cal Clark,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ng's Reform," in Yuming Shaw ed., *Mainland Chi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Refor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37~68.

註㊷ Weiwei Zhang, *Ideology and Economic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 1978-1993*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6), p. 2.

註㊸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 103~127.

註㊹ Zhiyue Bo, *China's Elite Politic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 pp. 255~295.

註㊺ Heike Holbig, "Ideological Refor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hina," in 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 eds.,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a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3~34; Heike Holbig, "Remaking the CCP's Ideology: Determinants, Progress, and Limits under Hu Jintao,"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 Vol. 38, No. 3 (Autumn 2009), pp. 35~61.

註㊻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系統的主要功能，從思想改造轉型至經濟現代化的促進者。㊼沈大偉也發現相較於過去，宣傳系統對思想的控制能力雖然出現萎縮，但中共從未眞正失去控制多數資訊傳播的能力，而是在控制上出現「放—收」的循環現象。㊽

總之，儘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已經降低，但並未消失在中國，仍影響著政策制定過程、領導人的權力鞏固、甚至是合理化政策的工具，顯示意識形態並非與現實無關。同樣重要的是，當與台灣在威權時期比較時，更可看出「三民主義」與官方意識形態的不同，主因是其並非一套邏輯縝密、擁有明確目標的思想體系，其模糊不明確的思想內涵，完全不同於列寧體制中的官方意識形態。㊾

肆、經濟領域：典型威權主義特性

本文鎖定目前中國的國家市場關係中，最重要的兩個行爲體—「國有部門／國有企業」和「私營部門／私營企業」—之改革過程及現況，再從比較視野來分析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到底是趨近於後史達林時期的蘇東共黨國家（後極權特性），還是趨近兩蔣時期、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典型威權特性）。根據回顧相關文獻、統計數據和比較的結果，本文認爲在經濟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已經不同於後極權時期蘇東國家的經濟模式，而更貼近台灣位於典型威權時期的經濟模式，表現出更廣泛的多元性。

一、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改革與現狀

（一）國有企業：管制高點、經濟命脈的獨占與壟斷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對國有企業進行「放權讓利」，不但擴大企業自主權，還讓其留下超出計畫額度後的利潤。㊿不過，這階段的國企改革僅環繞在統制經濟之內，只是對企業運作的內部「微調」及統制經濟的體制「完善」。51直到 1980 年代，中國才開始逐步引入市場機制，透過「兩權分離」(所有權歸國家、經營權歸企業) 和「價格雙軌制」(計畫價格和市場價格)，國家不再完全依賴行政命令指揮企業，而是用市場引導

註㊼　Shuyu Kong, “Cultural Propaganda in the Age of Economic Reform: Popular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hanxi Mercha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63（January 2010）, pp. 79~99.

註㊽　David Shambaugh, “Chinese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 and Efficacy,” *The China Journal*, No. 57（January 2007）, pp. 25~58.

註㊾　Chialung Lin,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pp. 26~27; Yangsun Chou and Andrew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Vol. 27, No. 3（March 1987）, pp. 277~299.

註㊿　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246~248。

註51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p. 396~408.

企業追求利潤，逐步將中國經濟由官僚經濟帶入市場競爭。㊷然而，儘管市場機制日益重要，此時的改革並未觸及所有權，在 1990 年代中葉以前，國有部門依舊是經濟上的主導力量。㊸

中共終於在 1990 年代中期，因爲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帶來的投資飢渴和循環性通貨膨脹，㊹開始進行所有權改制，其主要原則是「抓大放小」。在抓大方面，國家維持「關係到國家安全與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和基礎性與支柱產業領域」的控制力。㊺這些企業因爲得到國家的全力扶持，通常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絕佳競爭力；㊻在放小方面，國家讓地方政府決定中小型國企的去路，如果不是宣布倒閉，就是放入市場謀生路，藉由合併、拍賣和股份制，創造混合型企業和私企。隨著時間的進展，中小型國企朝向私有化的比例越來越高。㊼易言之，中共在進行所有權改革之餘，仍堅持抓住「管制高點」的大規模國企。

儘管國企在國民經濟的比例縮小了，卻不表示其已經失去重要性。中共仍抓住的大型國企，給予執政黨更多的職位供分配，並維持黨控制國家經濟的能力。㊽如上文所述，中共仍在國民經濟關鍵領域占據主導性的地位，該趨勢在 2003 年成立國資委以後進一步被強化，而近日出現的「國進民退」正是這些壟斷性產業壟斷程度的增加。㊾事實上，爲了執行中央和各省的產業發展策略、減少失業和維持社會安定，中央更傾向優先貸款給國有企業，㊿因此會利用金融機構，確保國有銀行將資源輸入大型國企裡，使國企擁有迅速且可觀的資本累積。(61)

註㊷ 1982 年的「以計畫調節爲主、市場調節爲輔」、1984 年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到 1992 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中國逐漸引入市場機制的最佳寫照。參見：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7）, p. 312.

註㊸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pp. 299~301; Yimin Lin and Tian Zhu, "Ownership Restructuring in Chinese State Industry: An Analysis of Evidence on Initial Organizational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6（June 2001）, pp. 305~341.

註㊹ Yu-Shan Wu,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9, No. 1（June 2003）, p. 119.

註㊺ 「我國明確七大行業將由國有經濟控制」，**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12/18/content_5502762.htm。

註㊻ Russel Smyth, "Should China Be Promoting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 Group,"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4（April 2000）, pp. 721~737.

註㊼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Yang Yao,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55（January 2006）, pp. 35~63.

註㊽ 吳木鑾，「走向國家資本主義？」，**21 世紀評論**（香港），2008 年第 110 期，頁 24~35。

註㊾ 「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 2011 年 4 月 12 日釋出」，**天則經濟研究室**，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2011/20110412.pdf。

註㊿ Kellee Tsai,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3.

註(61) Sebastian Heilmann, "Regulatory Innovation by Leninist Means: Communist Party Supervision in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1（March 2005）, pp. 1~21.

（二）私營企業：逐漸成為國民經濟主體的行為者

在改革開放以前，私營企業多數時間是不存在的，資產家被視爲剝削者和階級敵人而遭迫害。⑫即便在改革之初，目前的私營企業也還沒出現，私營經濟反倒是在「個體戶」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的，他們的社會地位偏低，受到社會的仇視。⑬直到 1988 年中共第一次修憲時，私企才獲得憲法上的地位。⑭不過當時私企只是公有制的補充，無法享受與國企同等的地位。直到鄧小平南巡後，私企的地位才再次獲得提升，中共接連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要平等對待市場競爭中不同的所有制成分，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立私營企業的合法地位，並在 1999 年修憲中肯定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⑮可知，一直要到 1990 年代以後，中國的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例才顯著增加。

本文試圖透過〈中國統計年鑑〉和〈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的數據，證明目前中國已出現「私營部門爲主，國有部門爲輔」的雙重結構，這種雙重結構與典型威權時期台灣的「官民共存」具有相似性（詳後）。本文發現除了企業總資產以外，私企在各大主要指標上都已超越國企，而且即便國企的總資產仍高於私企，但後者總資產的成長速率極快，表現追趕姿態。首先從企業單位數來看，在 2000 年以前私企均未曾超過國企，但從 2002 年開始，私企的數量首次超越國企，往後這個差距不斷暴增，到了 2010 年雙方差距已達到 70%（圖 1）。其次從城鄉就業人數來看，從事個體戶和私企的就業人口，從 1980 年後持續增加，並在 1990 年代暴增；相較之下，國企的就業人口從 1990 年代開始下降，儘管下降速率已經趨緩。在這個趨勢下，雙方就業人數在 2000 年基本打平，不久後私企的就業人口正式超越國企，並且持續拉開差距當中（圖 2）。

再從總產值來看，國企和私企均呈現上漲情勢，但私企年產值的增長速率，明顯高於國企；更重要的是，私企在 2009 年正式超越國企的總產值（圖 3）。至於從企業總資產來看，儘管國企的總資產超出私企整整一倍左右，但私企總資產的成長比例極高，在 2000-2005 年高達 682%（國有企業則是 40%）、在 2005~2010 年也高達 285%

註⑫ Dorothy Solinger, *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 in Contemporary China*（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註⑬ Thomas Gold, "Urban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22, No. 2/3（Summer/Autumn 1989）, pp. 187~201; Susan Young, *Private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註⑭ 1988 年憲法修正案中修正成：「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88）」，**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4/content_705980_8.htm。

註⑮ 陳健民、邱海雄，「貪腐、吸納與民主——中國政商關係的張力」，熊景明、關信基主編，**中外名學者論 21 世紀初的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23~126。關於 1999 年憲法修正案，關於私營經濟的條文是：「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99）」，**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4/content_705980_10.htm。

(國有企業則是 110%)，從中可見私企的活力，展現出追趕之姿 (圖 4)。最後從稅收總額來看，兩者在 2000 年左右主客易位，從過去國企多於私企，變成私企多於國企 (2001 年正式確立) (圖 5)。

統計數據會說話。過去被視爲非法的私企，終於在經歷一陣波折後，取得迅速的發展，甚至進入 2000 年以後，在各個重要經濟指標均超越國企的表現。〈經濟學人〉即以專刊方式，認爲中國的中小型私企才是中國經濟奇蹟的眞正貢獻者。[66]據此，本文認爲私營部門確實成爲中國經濟的主體，所謂的「公有制爲主」僅僅表現在對「經濟命脈」或「管制高點」這些要害產業部門和金融機構的控制，當前中國的經濟體制，應該是「私營部門爲主，公有部門爲輔」的雙重結構。

二、比較視野：後史達林蘇東共黨國家還是威權時期的台灣？

本文接著帶入比較視野，將中國與後史達林蘇東共黨國家 (後極權時期) 和兩蔣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台灣 (典型威權時期) 進行比較。首先，本文認爲中國在 1980 年代與前蘇東共黨國家的經濟模式非常相似。史達林死後，蘇聯歷任領導者均從事不同性質內容的經濟改革，但皆僅涉及對統制經濟內的微調和完善。[67]一直要到 1988 年，蘇聯才出現市場化改革，在國家主導下引入市場經濟，呈現計畫和市場共存、但前者重要性大於後者的現象，但仍不涉及所有權改革，這些均符合後極權概念的經濟特性。明顯地，中國在 1980 年代的經濟模式，與蘇聯在 1953-1988 年間十分類似。

然後，中國並沒有停留在此太久，而是逐漸走出不同於前蘇東國家的經濟模式。中國的私營部門不但在 1980 年代從農村和三資部門悄悄出現，[68]整體經濟更從 1990 年代以降因爲國企改制及承認私營企業的合法地位，而朝向私營部門爲主的趨勢發展。不過同時，國家還是維持對大型國企和要害經濟部門的控制，使得當前中國出現「私營部門爲主、公有部門爲輔」的雙重結構，這就非常貼近兩蔣、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的經濟模式。

台灣在兩蔣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式，基本上就是詹鶴提出的「發展型國家」。[69]根據他的觀點，發展型國家有三個核心特徵：第一、經濟官僚具有專業能力及相當的自主性，能夠選擇市場管制的政策工具及扶持特定產業，不受到特定社會利益或被企業財團挾持。第二、國家具有發展意識，亦即國家將傾全力達到經濟發展的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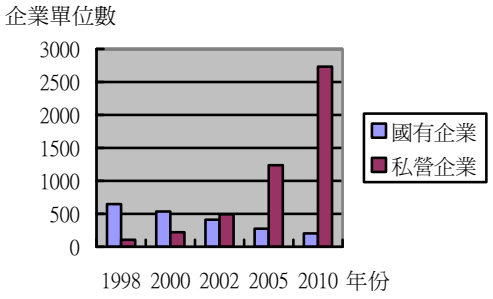
註[66] 經濟學人將這種現象稱爲「竹節型資本主義」，參見"China's Economy: Bamboo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10.

註[67]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俄羅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 (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頁 98~122。

註[68] 同前註，頁 146。

註[69]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14~320;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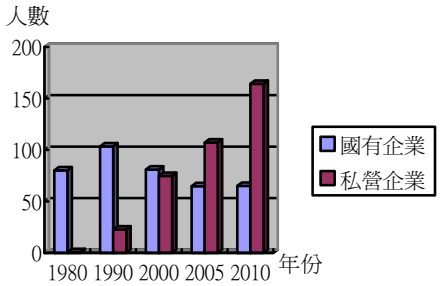
圖 1　企業單位數



單位：百個。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年），頁 516、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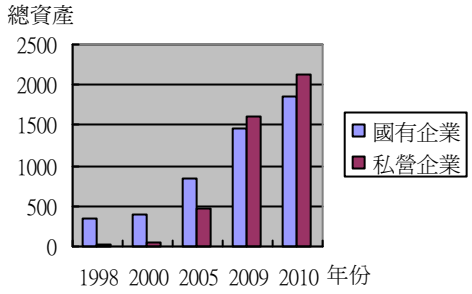
圖 2　城鄉企業就業人數



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頁 110~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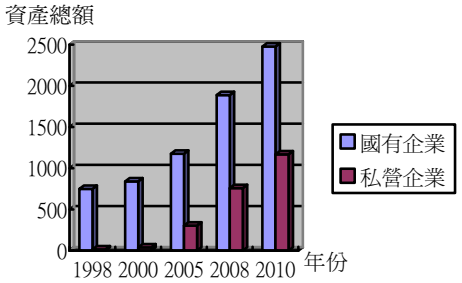
圖 3　企業年總資產



單位：百億元。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頁 516、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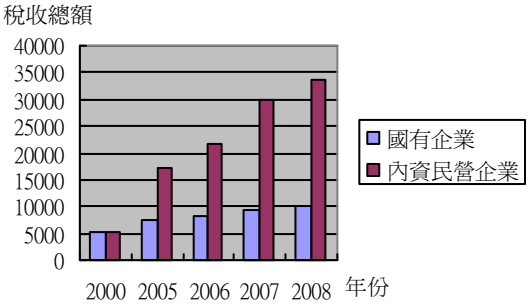
圖 4　企業資產總值



單位：百億元。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頁 516、526。

圖 5　企業稅收總額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黃孟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No. 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1。

標，在經濟中扮演發展角色，而不是掠奪角色；事實上，惟有當執政者和經濟官僚均對經濟發展有共識、意識，執政者才能全力支持經濟官僚自主地制定和執行產業政策，眞正達到執政者「統而不治」、經濟官僚「治而不統」。⑩第三、國家所有權形式必須是私營部門爲主、公有部門爲輔。如果不考慮國家的所有權形式，吾人將無法區分這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因爲在統制經濟體制，共黨同樣具有高度國家自主性及發展意識，但吾人當然不能稱其爲發展型國家。另外，發揚發展型國家的學者，也不斷提到公部門和私部門彼此之間緊密合作的重要性，像是透過國營事業和金融體系，帶動企業投資，與民間產業進行互補，在台灣稱爲「官民共存」。⑪

本文主張當前中國已經出現「發展型國家」的三個核心特徵。第一、學者指出當前中國的經濟官僚是理性務實的，具有專業性和自主性，基本上已不受太多馬列主義和老幹部的束縛。⑫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非民主國家，更能解決國家介入市場所出現的問題：如何讓大多數民衆服從本於經濟發展考量下的政策規劃。⑬中國不像民主國家，政治家需要獲得一定的選票才能維持政治權力，使得執政者爲了滿足特定的社會利益，打亂經濟官僚的政策制定過程和結果。台灣和南韓被視爲典型「發展型國家」的時期，就是在民主化前的威權統治時期，但當這兩個國家成爲民主政體時，發展型國家的特徵立即大幅弱化。⑭

第二、學者已經從實證分析及不同的分析層次，指出中國確實具有發展主義的意識。例如，Jean Oi 認爲地方政府的發展意識和企業家行爲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改革開放以後，中央進行農業去集體化和財政分權改革，地方政府有機會留下稅收額度外的收入，表示地方政府只要能促進經濟發展、獲得更多稅收，就能得到更多收入。這種誘因讓地方政府發揮企業家功能，就像是經營一家大規模的企業。⑮ Jane Duckett

---

註⑩ Yu-Shan Wu,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Afte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Asian Survey*, Vol. 47,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7), p. 980.

註⑪ 劉進慶、涂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台北：人間出版社，1993年），頁 95~161。

註⑫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Yu-Shan Wu, “Away From Socialism: The Asian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9, No. 3 (September 1996), pp. 410~425.

註⑬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p. 50.

註⑭ 關於台灣參見：Yu-Shan Wu, “Taiwan’s Development State: Afte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pp. 977~1001；關於南韓參見：David Kang,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Phil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8~170; John Minns, “Of Miracles and Mode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6 (December 2001), pp. 1025~1043; 關於戰時日本參見：Chalmers Johns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Frederi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zat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7.

註⑮ Jean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則將分析單位放在官僚部門，指出它們會建立尋求利潤和規避風險的企業，直接從事商業行爲。這些行爲是追求利潤和規避風險的，而不見得是尋租的，中國因此是一個「企業型國家」，而不是掠奪型國家。⑯ Lance Gore 鎖定地方領導幹部，認爲他們是地方社會的代表，在兼具政治和社會考量的情況下，從事促進經濟發展的商業行爲，因此是發展型而非掠奪型取向。⑰

第三、本文在上述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討論當中，證明當前中國經濟是「私營部門爲主、公有部門爲輔」的雙重結構。這種雙重結構如同台灣在典型威權主義時期的「官民共存」。在台灣威權統治早期，國民黨就將日本殖民時代所建立的獨佔經濟體制完全繼承下來，這些公營事業壟斷經濟要害部門及金融機構。⑱在民營企業方面，台灣在 1960 年代轉向出口導向以後，民營企業才算獲得發展，並因爲快速的擴張，逐漸成爲台灣「經濟奇蹟」的貢獻者。因此，儘管當時台灣的經濟結構屬於公營企業領導體制，但從實際內容來看，民營企業反而才是帶動經濟急速成長的主要動力，進而導致公民營企業互相消長的局面。⑲換言之，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發展，基本上就是公營部門支配產業和金融的「管制高地」，而私營部門完成了出口導向推動經濟成長的任務，並日漸成爲經濟主體（企業數、資產額和從業人數），這就是台灣「官民共存」的具體表現。⑳

上述台灣「官民共存」的經濟結構也出現在當前中國。如同上述對國有企業的討論，目前中共的「公有制爲主」就是對關鍵領域及支柱產業進行掌控，藉由金融機構扶持這些大型國有企業，讓它們在全球市場擁有強大競爭力，類似過去東亞發展型國家也會運用國家力量，製造出代表本國的「冠軍企業」。㉑同樣如同上文對私營企業的討論，目前私營企業在幾個重要經濟指標上，已經超越國有企業，成爲經濟運作的要角。據此有學者指出，與日本和南韓相比，當前中國因爲和過去台灣均有公／私營制共存的現象，因此更貼近台灣式的發展型國家。㉒

註⑯　Jane Duckett,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in China: Rural Estate and Commerce Department in Reform Era Tianjin*（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4~15, 155~160.

註⑰　Lance Gore, *Market Commun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China's Post-Mao Hyper-Growth*（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⑱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1991 年）。

註⑲　若林正丈，**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經濟**（台北：故鄉出版公司，1988 年），頁 67。

註⑳　劉進慶、涂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頁 134。

註㉑　Margaret Pearson, "The Business of Governing Business in China: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Emerging Regulatory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57, No. 2（January 2005）, p. 313.

註㉒　Seung-Wook Baek, "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5, No. 4（Winter 2005）, pp. 485~498. 必須注意的是，這不表示中國和台灣是一樣的經濟體。關於兩者間的不同可見：Kellee Tsai, "Off Balanc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Fiscal Feder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2（Fall 2004）, pp. 1~26; Seung-Wook Baek, "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pp. 494~495. 然而本文認爲學者指出的差異，並未涉及發展型國家的核心特徵，不影響判斷中國是否爲發展型國家。

根據上文分析，本文認爲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確實相當貼近典型威權主義的特性。誠然，東亞發展型國家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而與本文要探討的政體類型不完全相同，但是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一個非民主政體在後極權階段時，根本不可能採取發展型國家的經濟模式，主因在於後極權時期根本不觸及所有權／私有化的改革。

伍、社會領域：後極權主義特性

一、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

本文接著討論社會領域的研究議題。首先，在評析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的相關文獻後，發現學者均指出它們表現出「既被鼓勵又被限制」的後極權特性。首先在社會組織方面，社會組織一方面因爲市場經濟創造出由下而上的社會利益，另一方面因爲國家不再試圖完全控制社會、有意識地讓渡某些社會功能而獲得更多的自主空間。[83]例如，學者發現「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在禁用營業用三輪車的議題上，出乎意料代表殘疾人士與國家展開長期的討價還價，他們認爲這代表著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對殘聯產生了影響。殘疾人士持續的社會抗爭，不但給予殘聯壓力，更提供其向國家建言、發揮代表性功能的機會。[84]再例如 Andrew Mertha 提出「水武士」描述社會力量如何通過「政策企業家」和「環保團體與媒體」影響中國的水資源政治。[85] Tony Saich 則認爲目前中國與社團的互動，後者已具備更多的議價空間，某些與國家有緊密關係的社團，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政策過程。易言之，國家在面對社會時已經由「自主型國家」轉變成「協商型國家」。[86]

然而，國家依舊限制社會的多元性，社會組織多半受到中國制度環境或者「國家框架」的限制，這可以分爲兩個部分來談。第一、吾人看到的某些新興社會團體，其實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過程中，將原屬政府承擔的職能，轉移至這些社團。因此這些社團更像是國家行政的附屬品，僅僅是行政機關的延伸，而不必然是國家社會間的中介

註[83] Feng Chen,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6 (December 2003), pp. 1006~1028; 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e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a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5), pp. 29~53.

註[84] Xi Chen and Ping Xu, “From Resistance to Advocacy: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7 (September 2011), pp. 649~667.

註[85] Andrew Mertha, *Water Warriors: Citizen Action and Policy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86]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 eds., *China’s Deep Reform: Domestic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285~302.

溝通參與者。[87]還有學者指出，當前中國與社會團體的互動，雙方是統合關係，國家藉由與社會團體的「階層式溝通」，不但獲得所需資訊，也透過社團提供社會服務；換言之，國家仍握有主導權。[88]王信賢和李宗義也提到，這種部門轉職而來的社會團體具有「高社會服務、低政權威脅」的性質，不但爲國家提供社會服務，更是原官僚部門的代理人，扮演小金庫和職位安插的角色。總之，這些社會團體的自主性受到極大的限制。[89]

第二、就算不是部門轉職的新興草根性社團，其自主性還是因爲「制度障礙」和「有限社會資源」而受到限制。前者是指國家藉由「雙重管理體制」，[90]控制社團的成立、資金和人事；後者是指國家刻意將草根團體限制成二級組織，致使其社會資源十分有限，無法長期維持獨立與有效運作。總之，中國社會團體猶如受制於「國家框架」的籠中鳥，只能在官方設定的範圍內運作，形成一種「鳥籠社會」。[91]這種「既鼓勵又限制」的特徵，非常符合後極權主義的特性。

其次在社會抗爭方面，本文發現學者指出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次數、頻率已經大幅增加，抗爭群體也朝向多元化發展，[92]這就與極權主義有所不同；此外，抗爭運動十分仰賴非暴力的「依法抗爭」，[93]或者依靠具有動員能力的抗爭領袖，藉由不同政府層級可能存在不同對待社會抗爭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94]對於上級政府（特別是中

註[87]　Kenneth Foster, "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ies: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Yantai," *The China Journal*, No. 47 (January 2002), pp. 41~65.

註[88]　Taru Salmenkari, "Searching for a Chinese Civil Society Model," *China Information*, Vol. 22, No. 3 (November 2008), pp. 397~421.

註[89]　王信賢、李宗義，「尋找中國 NGOs：兩種路徑與困境」，**社會科學論叢**，第 2 卷第 2 期（2008 年 10 月），頁 113~146。

註[90]　關於「雙重管理體制」參見：王信賢、王占璽，「夾縫求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頁 27~51。

註[91]　王信賢、李宗義，「尋找中國 NGOs：兩種路徑與困境」，頁 137~138。

註[92]　Jae Ho Chung, Hongyi Lai and Ming Xia, "Mounting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in China: Surveying Collective Protestors, Religious Sects and Criminal Organiza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6 (July 2006), pp. 1~31.

註[93]　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Kevin O'Brien, "Neither Transgressive Nor Contained: Boundary-Spanning Contention in China,"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Routlege, 2004), pp. 105~122; Dorothy Solinger, "The New Crowd of the Dispossessed: The Shift of the Urban Proletariat from Master to Mendicant,"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Routlege, 2004), pp. 50~66.

註[94]　Lianjiang Li and Kevin O'Brien, "Protest Leadership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3 (March 2008), pp. 1~23; Yongshun Cai, "The Resistance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0 (June 2002), pp. 327~344; Yongshun Cai,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777~799; Thomas Bernstein and Xiaobo Lu,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央）來說，它們有時未必會阻礙抗爭的發生，因爲這提供糾舉下級政府的資訊。不過同一時間，國家仍對抗爭設下諸多制度限制，甚至會進行鎮壓，[95]儘管鎮壓有時候會帶來反效果。[96]

據此，本文主張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性質反映出後極權特性。根據 L&S 的定義，經歷極權統治的國家會在後極權時期開始主導「去極權化」，減少國家對社會的控制程度和範圍，社會將出現相對多元性。不過，社會因爲去極權化而出現看似與國家站在對立面的行爲者（例如抗爭者），反而是國家容許下出來的結果。本文認爲，他們的描述相當符合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特徵，依然表現出國家一方面鼓勵多元性，另一方面又限制多元性之「被管理的多元主義」的現象。總之，當前中國的社會抗爭既可能被容許和鼓勵，也可能被限制和鎮壓，就是後極權階段在社會面上的特性。

此外，中國歷經極權統治時期，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手段和能力，明顯高於未經歷極權統治的典型威權國家。例如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1980 年開始因爲經濟發展而帶來市民社會的崛起，出現大量的反對運動。[97]檢視台灣的反對運動，很輕易可以發現其與中國社會抗爭的不同。第一、台灣反對運動的行爲者是跨群體的，主要包括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三者之間甚至有隱約的分工，即知識份子爲反對運動提供策略，小資產階級位主要的資源貢獻者，工人階級則爲主要的選民。[98]在中國，多數社會抗爭均看不見抗爭群體間的串聯與互動。第二、台灣反對運動從 1977 年的中壢事件以後，開始朝向組織化，[99]但在中國卻幾乎不存在大規模的組織化抗爭。可知，當前中國對社會抗爭的控制力道強過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中國很難出現像台灣的跨群體、大規模、組織化的社會抗爭。

二、基層選舉

中國基層選舉是目前國家與社會間的制度連結，可作爲社會多元性本質的反映。本文回顧基層選舉的文獻後，主張基層選舉出現後極權特性。目前中共實施多種基層選舉，其中以村委會選舉最受到學界重視。改革開放以後，中共逐步藉由村選舉和村民自治，解決基層權力真空及黨群關係緊張化的問題。[100]換言之，村選舉是中共有意識

註[95] Yongshun Cai, “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59（January 2008）, pp. 89~109；王信賢，「爲何鎮壓？中國社會抗爭與國家的策略選擇」，發表於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2012 年 6 月 2 日），頁 1~27。

註[96] Thomas Bernstein and Xiaobo Lu,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p. 139; Yongshun Cai, “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3（July 2008）, pp. 411~432.

註[97] 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p. 3.

註[98] 王振寰，「反對運動與台灣的政治轉型」，王振寰主編，**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 年），頁 46~47。

註[99] 同前註，頁 48~49。

註[100] Kevin O’Brien,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a Affairs*, No. 32（July 1994）, pp. 33~59; Tyrene White, “Rural Politics in the 1990s: Rebuilding Grassroots Institutions,” *Current History*, Vol. 91, No. 566（September 1992）, pp. 273~277.

推動的選舉。Kevin O'Brien 和 Lianjiang Li 就指出，革命老幹部是村選舉最有力的推動者，⑩Tianjian Shi 也指出中層菁英（民政部）對推動村選舉的積極作用。⑫最終，經過長期辯論、試點，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1987 年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並在 1998 年正式完成立法。

在現有文獻中，本文發現多數學者都認爲村選舉具有顯著的政治效果，影響村民的政治生活，村幹部變得更有回應性，村民在政治中不再是無作用的行爲者，不同於毛時期的黨群關係。例如，由於候選人必須獲得一定選票才能當選，村選舉可以增加村幹部和村民之間的「契合度」(congruence)，亦即一種政治連結。⑬其他學者也提出類似觀點，他們發現在自由公平選舉中當選的村幹部，通常更願意在土地重分配時，回應村民對公平原則的偏好。⑭

這表示無論對村民和村委會而言，村選舉都具有「授權效果」。對村民而言，村選舉提供村民撤換村幹部的機會，較能選出負責任、肯回應村民的幹部，使其在執行國家政策時，較不會偏袒某方利益。⑮此外，學者也發現村選舉能減少地方幹部的尋租行爲，即使選舉本身未必是公平的。⑯何包鋼和郎友興更發現，農村能人與企業老闆因爲村選舉，對黨支部書記的權力產生衝擊，他們甚至會試圖謀求政治職位，出現「老闆書記」。⑰對村委會而言，一旦村幹部是在一個高投票率選舉中當選的，村委會就獲得相較於黨支部更多的授權，進而可能造成村委會與黨支部間在經濟議題上發生紛爭。⑱另有學者發現，自由公平的選舉能加強村委會與村民的接觸，共同抵抗鄉鎮幹部的政策，因而有助於提升村委會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⑲村選舉甚至能讓村幹部

註⑩ 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 (June 2000), pp. 465~489.

註⑫ Tianjian Shi,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3 (April 1999), pp. 385~412.

註⑬ Melanie Manion,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4 (December 1996), pp. 736~748.

註⑭ John Kennedy, Scott Rozelle and Shi Yaojiang, "Elected Leaders and Collective Land: Farmers' Evaluation of Village Leaders' Performanc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Spring 2004), pp. 1~22.

註⑮ Lianjian Li,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July/August 2003), pp. 648~662.

註⑯ Loren Brandt and Matthew Turner, "The Usefulness of Corruptible Elections: The Case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19, No. 3 (November 2007), pp. 453~480.

註⑰ 何包鋼、郎友興，**尋找民主與權威的平衡：浙江村民選舉經驗**（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註⑱ Zhenglin Guo and Thomas Bernstein, "The Impact of Elections on the Village Structure of Pow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Village Committees and Party Bran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3, No. 39 (May 2004), pp. 257~275.

註⑲ Lianjian Li, "Election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Vol. 15, No. 2 (October 2001), pp. 1~19.

願意將村民利益，置於鄉鎮政府和村黨支部的利益之上。⑩

然而，村選舉的「授權效果」，是否表示一種不受限的社會多元性，已經出現在農村呢？從學者的研究可看出，即使最小程度的多元性因爲村選舉而出現，它只是體制內多元，即是在黨國控制下的多元性。根據現有文獻，本文從兩個方面來闡述之。第一、黨控制村選舉的選舉過程。按照法令規定，村委會幹部的候選名額必須多於應選名額；再者，村民可以自發性提名，選舉也必須是無記名投票和公開記票。據此來看，村的選舉過程事實上已大幅改善，符合中共當初「先求有，再求好」的預期。莫寧就認爲，約從 1998 年開始，選舉程序就明顯進步了，舉凡匿名投票、公開計票和保證差額選舉，基本上已普遍施行全國。⑪部分學者甚至指出，若單從選舉程序來看，村選舉甚至相當貼近西方選舉的標準。⑫

但事實上，黨仍然控制選舉過程，特別是最重要的提名過程。黨／鄉鎮政府不但會干涉提名人選，還可以決定最終的候選人名單。在這種情況下，黨管幹部的原則得到維持，中國的選舉反而更像是一種選拔，而不是選舉。⑬Pierre Landry 等人提出另種理解黨控制選舉的視角：他們發現即使知道選舉是有利於黨員，只要村民有撤換幹部的機會，他們就會願意出來投票，甚至認爲選舉是競爭的，從而增強對政權的支持；換言之，無論選舉過程有無受到黨的控制，只要選舉有適當的多元性，村選舉就有助於政權穩定。⑭

第二、村委會在「選後」的運作，依舊受到黨支部和鄉鎮政府的控制。李連江和歐博文很早就提出，當初試行村選舉時，從省到村的各級幹部，就以各種方式進行抵制。其中，特別是來自鄉鎮一級幹部的阻力，因爲「她們擔心選舉將使她們失去最可靠的村幹部」。⑮更嚴重的情形發生在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係。部分學者認爲，儘管村選舉提供撤換村幹部的機會，但村的實權還是由掌握企業經營權、集體財分配權的村支部書記控制。⑯另有學者發現，雖然村委會獲得權力的方式改變了，但其權力執行並未出現本質性改變，還是受到鄉鎮政府、村黨支部和社會力量（包括宗族、宗教組

註⑩ Baogang He, *Rural Democracy in China: The Role of Village Elections*（New York: Palgrave McMillian, 2007）, pp. 109~111.

註⑪ Melanie Manion, "How to Assess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in Kevin O'Brien and Zhao Suisheng eds., *Grassroots Elections in China*（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22.

註⑫ Kevin O'Brien and Rongbin Han, "Path to Democracy? 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0（June 2009）, pp. 359~378.

註⑬ Wenhsuan Tsai and Penghsiang Kuo, "Public Nomination and Direct Election in China: An Adaptive Mechanism for Party Recruitment and Regime Perpetuation," *Asian Survey*, Vol. 52, No. 3（May/June 2012）, pp. 484~503.

註⑭ Pierre Landry, Deborah Davis and Shiru Wang,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Competition Without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6（June 2010）, pp. 763~790.

註⑮ 李連江、歐博文，「村民自治：構想與實踐」，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332~333。

註⑯ Jean Oi and Scott Rozelle,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June 2000）, pp. 513~539.

織與黑社會）的干擾。⑰

總結基層選舉的文獻，可以發現基層選舉雖然爲社會人民帶來「授權作用」，體現一定程度的社會多元性，但是黨仍然控制選舉過程，並限制村委會在選後的行動，這就限制了基層選舉至多只爲社會帶來體制內多元，展現後極權特性。

陸、結　論

本文藉由近 150 筆的二手文獻，整理歸納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後，主張當前中國揉合了蘇東共黨國家之後極權特性（政治、社會領域）及兩蔣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之典型威權主義特性（經濟領域）。⑱不過，這不代表本文主張需要創造一個新概念，因爲當前中國政體的混合特性，仍然處在一段持續變遷的過程而非結果。惟有當這種混合特性更加穩定，甚至發展出不同於過往任何非民主政體之發展經驗時，學界才有充分的理由認定其是一種新形態的非民主政體。相反的，本文僅想強調當前中國是一個揉合、混合前蘇東共黨國家及台灣威權時期特徵的非民主政體，至於未來走向發展爲何，仍須進一步的觀察而非輕易下定論。⑲

這種混合特性代表著中國在脫離毛澤東統治之後，「政經社」三個領域的轉型幅度有所不同，即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而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此外，吾人也能觀察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出現那些變（例如在菁英選拔上更重視專業憑證、政治動員內容與性質的轉變、私營經濟的繁榮、社會組織及抗爭被適度的容忍等等）與不變（例如菁英的政治資深度和派系考量仍然是菁英選拔的重要因素、全國性的政治動員仍然存在、宣傳部門仍然堅守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國有企業仍然掌握關鍵產業的控制、社會組織仍然受到官僚控制等等）。同樣重要的，這種混合特性更讓中國政體出現內部張力。該張力源自經濟領域散發出來的多元性所產生的潛在政治威脅和社會新興力量，國家因此必須隨時找尋新的方法，維持對它們的滲透、控制。例如，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和多元化，「網民」遂成爲代表不同社會利益的行爲者，中共也意識到網路對政權可能的威脅，因此不斷藉由軟硬體滲透網路，甚至不惜以最高領

註⑰　Kevin O'Brien and Rongbin Han, "Path to Democracy? 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pp. 367~376.

註⑱　表面來看，本文的研究發現類似吳玉山提出的「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但雙方的差異是存在的。首先，吳玉山的文章並不直接涉及政體類型的討論，這與本文試圖站在非民主政體既有的概念系譜上，討論中國的政體類型有所不同；其次，吳玉山雖然指出中國在經濟發展上與東亞發展型國家有高度相似性，卻沒有具體、深入地給予解釋；最後，本文涉及的研究議題、文獻數量更多且全面，更符合這類研究的要求。

註⑲　另一個不輕易將中國視作新形態非民主政體的理由是，如果僅爲了中國創造出一個新概念，這個概念將因爲難以適用到其他國家而不具備分析效用。因此，本文更主張應該透過比較視野來理解中國政體。例如，部分學者認爲越南改革與中國具有可比性，參見：Yu-Shan Wu and Tsai-Wei Sun, "Four Faces of Vietnamese Communism: Small Countries' Institutional Choice under Hegemon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4（December 1998）, pp. 381~399.

導人擔任「網安小組」的組長，持續加強管理中國的網路資訊。⑲再例如上文對社會組織的分析，也能看到中共一方面鬆綁對社會團體的控制，另方面卻設立「雙重管理體制」，透過行政干預回頭滲透這些團體。當然，中共並非總能有效控制政治異議和社會勢力，有時還是只能憑藉公開的暴力手段強制鎮壓之，例如對劉曉波、艾未未的拘捕，抑或是越來越常出現的暴力性社會抗爭。這些事實均指向揉合著後極權和典型威權特性的中國政體，確實出現顯著的內在張力，並持續影響未來的發展。

本文的研究發現，提供三個未來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研究議程。第一、造成中國政體類型出現混合特性的原因爲何？又是什麼機制使得這樣的揉合成爲可能？本文在此提供一個初步的答案。借用學者的語言，這是中共在執政黨能力萎縮的過程中，作出調適的結果。改革開放後，中共深入分析各類一黨專政國家崩潰的原因，根據這些經驗推出一系列改革，例如鑑於蘇東國家的崩潰經驗，推動政治繼承和漸進的企業改革；又鑑於威權國家進行政經改革後，經濟和社會勢力會回頭威脅當權者，中共限縮政治領域只存在黨國體制內、漸進式和難以追蹤的改革，在目的上也只能是強化執政黨的。⑳因此，對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及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中共仍維持後極權特性，儘管在經濟上願意釋放出更多的多元性。

當討論揉合機制時，上述現象將更顯著。本文特別點出執政黨對於當前中國能一方面揉合後極權及典型威權特性，另一方面還能維持政權穩定的作用。在現有文獻中，執政黨被視爲非民主國家能否維持政權穩定的關鍵。㉑當前中國也不例外，執政黨持續利用黨國體制吸納新興社會、經濟勢力，因此我們能看到，儘管中國出現高速經濟增長，黨國仍能維持對社經多元化與對政治自由化要求的控制。舉例來說，學者藉由實證分析，發現隨著地方社會利益多元化後，中共開始藉由地方政治協商會議吸納來自地方的非共黨菁英或社會領袖，維持政權穩定。㉒再例如中共一方面允許私營部門及企業主的擴張，但在另一方面又將其吸納至黨國體制，在給予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確保他們對目前政權的支持。又例如中共藉由基層選舉，提供社會人民政治參與的機會，允許社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偏好，猶如社會「安全閥」，但執政黨卻在同時間又會限制這樣的多元性，諸如透過限制直選層級、干涉提名過程等等，確保基層選舉不會直接威脅到中共政權。

註⑲ 「傳陸設網安小組 習近平掌管」，**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01080043-1.aspx。

註⑳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p. 4.

註㉑ Jason Brownlee,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eatriz Magaloni, "Credible Power-Sharing and the Longevity of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January 2008）, pp. 715~741.

註㉒ Xiaojun Yan, "Regime Inclusion and the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Local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Post-Mao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66（July 2011）, pp. 53~75.

第二、關於非民主政體的概念分類。當學者從事政體分類時，經濟因素究竟該扮演何種角色？誠然，我們很難單獨從經濟面向來判斷一個非民主國家屬於那種類型的非民主政體，這也是爲什麼現有分類多集中在政治因素。本文同意在政體分類上，政治因素確實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不過當前中國政體的混合特性，使本文主張就算經濟因素不是決定性因素，也應該是一個輔助性因素。

從中國案例來看，如果本文參照多數學者捨棄經濟因素的做法，當前中國就是一個完全的後極權政體；然而，正是因爲當前中國的經濟領域貼近典型威權主義的特徵，加上它仍處在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吾人就必須考慮到經濟因素帶動政治、社會領域出現變化的可能。例如，政治和社會領域同樣隨著經濟領域的腳步，從後極權轉型到典型威權主義。這種路徑是可能發生的，目前吾人已經看到社會上不斷出現人民因爲經濟議題挑戰國家的抗爭事件（例如什邡事件）。儘管目前中共仍維持控制社會力量的能力，但這個能力是否隨著經濟多元性的日益增加而弱化，必須持續的觀察。又或者，政治和社會領域不但沒有追隨經濟領域的腳步，反而回頭加強、鞏固後極權主義的特徵。這種路徑同樣可能發生。總之，儘管現在無法得知經濟領域的典型威權特性，究竟會將中國帶向那裡，但不可否認的，經濟因素將持續影響黨國的運作及國家與社會間的關係，這就是何以未來學者需更重視經濟因素，而不是直接忽略之。⑭

第三、未來學界應該從事更多的少量案例比較研究，一方面明確化後極權主義的概念內涵，另一方面釐清鄰近概念之間的關係。這個研究議程的必要性起源於此問題：如果一個非民主政體不是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同一種特性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判斷其政體類型？亦即，當前中國政體展現出混合時，到底應該用後極權還是典型威權來定位之？從目前的研究進程來看，這個問題無法解決，主因除了是後極權主義本身的概念定義就不精確，更是其與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概念邊界相當模糊。當初 L&S 提出後極權主義時，僅僅只是對比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的產物，而不像後兩者有明確的表列式特徵。不過本文主張，未來學界有必須解決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因爲在研究共黨類型的非民主國家時，後極權主義更能突出這些國家曾經歷一段不同於非共黨國家的統治時期。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本文主張，若要明確化概念內涵及釐清概念邊界，最適合的方式就是透過少量個案的比較研究（small-n/comparative studies），從實證研究中進行概念建立（concept building），並且清晰化概念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說，未來學界可以針對具有後極權傾向的國家進行比較研究（例如中國與越南、中國與前蘇東國家），以及比較後極權國家與典型威權國家的異同（例如中國與台灣威權時期），如此將有助於明確化相關概念的概念內涵。

註⑭　這也暗示了目前中國政體的混合特性處在一個過程之中。如正文所述，目前中國既可能伴隨社經利益的多元複雜化，使中共因爲無法有效控制之而必須進行深化的政治改革、再次放鬆對社會領域的控制，而更趨向典型威權特性；但也可能因爲持續的高經濟成長，一方面增加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另方面藉由經濟資源投注在更有效的控制機制，因而回頭鞏固統治權、維持對社會領域的有效滲透，而保持後極權特性。這值得吾人持續關注之。

*　　*　　*

(收件：102 年 8 月 15 日，接受：103 年 8 月 5 日)

Varieties of Authoritarianism: In Search of China's Regime Type

Chieh Kao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bstract

What is China's current regime typ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adopted and revised the classification purposed by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then reviewed literatures according to this revised framework, in which the paper separated it int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etal spheres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By reviewing nearly 150 works (including books, journal papers, and book chapters),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etal spheres, China is close to the former communist states in the Post-Stalin USSR (labeled as post-totalitarianism); while in the economic sphere China shares a number of similarities with authoritarian Taiwan. Thus, China is neither a post-totalitarian regime, nor a resurgence of classical authoritarianism that prevailingly existed in the 1970-1980s. Instead, China combines both post-totalitarian and classical authoritarian characteristics, dubbed as "varieties of authoritarianism".

Three research agenda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 merit further attention. First, students of Chinese politics should examine the factors that not only led to the hybrid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regime, but how could China, up to a point, successfully mix them? Second, economic factors should have more effect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non-democracies. Third, for a clear-cut definition and conceptual boundary of post-totalitarianism, scholars need to conduct more small-n analyses.

Keywords: China, Regime Type,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st-Totalitarianism, Classical Authoritarianism

參 考 文 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88）」，**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4/content_705980_8.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99）」，**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4/content_705980_10.htm。

「我國明確七大行業將由國有經濟控制」，**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12/18/content_5502762.htm。

「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 2011 年 4 月 12 日釋出」，**天則經濟研究室**，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2011/20110412.pdf。

「傳陸設網安小組 習近平掌管」，**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01080043-1.aspx。

「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求是理論網**，http://www.qstheory.cn/tbzt/tbzt_2013/qzlxjysj/。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 1921 年 7 月-2011 年 6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年）。

王信賢、王占璽，「夾縫求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頁 27~51。

王信賢、李宗義，「尋找中國 NGOs：兩種路徑與困境」，**社會科學論叢**，第 2 卷第 2 期（2008 年 10 月），頁 113~146。

王信賢，「爲何鎮壓？中國社會抗爭與國家的策略選擇」，發表於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2012 年 6 月 2 日）。

王振寰，「反對運動與台灣的政治轉型」，王振寰主編，**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 年），頁 46~49。

何包鋼、郎友興，**尋找民主與權威的平衡：浙江村民選舉經驗**（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吳文程，**台灣的民主轉型：從權威型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台北：時英出版社，1996 年）。

吳木鑾，「走向國家資本主義？」，**21 世紀評論**（香港），2008 年第 110 期，頁 24~35。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俄羅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

吳玉山，「觀察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309~335。

李連江、歐博文，「村民自治：構想與實踐」，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

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332~333。
林佳龍，「比較兩岸的政體轉型：台灣民主化對中國的啓示」，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頁 25~66。
林佳龍、徐斯勤，「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11~20。
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 年）。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北京：清華大學，2007 年）。
若林正丈，**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經濟**（台北：故鄉出版公司，1988 年）。
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28。
寇健文、陳方隅，「1978 年以後中共財經高官的仕途流動：特徵與趨勢」，**政治學報**，2009 年第 47 期，頁 59~103。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書局，2010 年）。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1991 年）。
陳健民、邱海雄，「貪腐、吸納與民主—中國政商關係的張力」，熊景明、關信基主編，**中外名學者論 21 世紀初的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23~126。
黃孟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No. 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趙建民，**威權政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劉進慶、涂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台北：人間出版社，1993 年）。
蕭功秦，「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戰略與管理**（北京），2002 年第 6 期，頁 82~88。
"China's Economy: Bamboo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10.
Bachman, David,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95~100.
Baek, Seung-Wook, "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5, No. 4 (Winter 2005), pp. 485~498.
Balzer, Harley, "State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China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c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235~256.
Barme, Geremie,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8~220.

Bernstein, Thomas and Xiaobo Lu,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Bian, Yanjie, Xiaoling Shu and John Loga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Social Forces*, Vol. 79, No. 3 (March 2001), pp. 805~841.

Bo, Zhiyue, *China's Elite Politics: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z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0).

Bo, Zhiyue, *China's Elite Politic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7).

Brady, Anne-Marie,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Brandt, Loren and Matthew Turner, "The Usefulness of Corruptible Elections: The Case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19, No. 3 (November 2007), pp. 453~480.

Brownlee, Jason,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ai, Yongshun, "The Resistance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0 (June 2002), pp. 327~344.

Cai, Yongshun,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777~799.

Cai, Yongshun, "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59 (January 2008), pp. 89~109.

Cai, Yongshun, "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3 (July 2008), pp. 411~432.

Chehabi, Houchang and Juan Linz, *Sultanistic Regimes*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en, Feng,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6 (December 2003), pp. 1006~1028.

Chen, Xi and Ping Xu, "From Resistance to Advocacy: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7 (September 2011), pp. 649~667.

Chou, Yangsun and Andrew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Vol. 27, No. 3 (March 1987), pp. 277~299.

Chung, Jae Ho, Hongyi Lai and Ming Xia, "Mounting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in China: Surveying Collective Protestors, Religious Sects and Criminal Organiza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6 (July 2006), pp. 1~31.

Clark, Cal,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ng's Reform," in

Yuming Shaw ed., *Mainland Chi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Refor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37~68.

Dickson, Bruce and Maria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1 (February 2000), pp. 87~112.

Ding, Xueliang,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in China: Legitimacy Crisis, 1977-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Dittmer, Lowe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53~67.

Duckett, Jane,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in China: Rural Estate and Commerce Department in Reform Era Tianjin* (London: Routledge, 1998).

Fewsmith, Joseph, "The New Shape of Elit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83~93.

Fewsmith, Joseph, *China Since Tiananmen: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2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Foster, Kenneth, "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ies: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Yantai," *The China Journal*, No. 47 (January 2002), pp. 41~65.

Garnaut, Ross, Ligang Song and Yang Yao,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55 (January 2006), pp. 35~63.

Geddes, Barbara,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June 1999), pp. 115~144.

Gold, Thomas,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Gold, Thomas, "Urban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22, No. 2/3 (Summer/Autumn 1989), pp. 187~201.

Gore, Lance, *Market Commun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China's Post-Mao Hyper-Growt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Gries, Peter Hays, "Popular Nationalism and State Legitimation in China,"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pp. 180~194.

Guo, Sujian, *Post-Mao China: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Authoritarianism?*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Guo, Zhenglin and Thomas Bernstein, "The Impact of Elections on the Village Structure of Pow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Village Committees and Party Bran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3, No. 39 (May 2004), pp. 257~275.

He, Baogang, *Rural Democracy in China: The Role of Village El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ian, 2007).

Heilmann, Sebastian, "Regulatory Innovation by Leninist Means: Communist Party Supervision in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1 (March 2005), pp. 1~21.

Holbig, Heike, "Ideological Refor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hina," in 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 eds.,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a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3~34.

Holbig, Heike, "Remaking the CCP's Ideology: Determinants, Progress, and Limits under Hu Jintao,"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 Vol. 38, No. 3 (Autumn 2009), pp. 35~61.

Huang, Hsin-Hao, "Institutionalizing Political Entry into the CCP Politburo: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nfigurative Comparative Method,"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it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vember 6-7, 2010).

Huang, J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80~97.

Huntington, Samue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3~47.

Johnson, Chalmers,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14~320.

Johnson, Chalmer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Frederi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zat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36~164.

Johnson, Chalmer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7~50.

Kang, David,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Phil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ennedy, James, "Legiti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wo Increases, One Redu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0 (May 2009), pp. 391~395.

Kennedy, John, Scott Rozelle and Shi Yaojiang, "Elected Leaders and Collective Land: Farmers' Evaluation of Village Leaders' Performanc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Spring 2004), pp. 1~22.

Kong, Shuyu, "Cultural Propaganda in the Age of Economic Reform: Popular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hanxi Mercha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63 (January 2010), pp. 79~99.

Kornai, Janos,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Kou, Chien-Wen, "The Rise of Youth League Affiliates after 1978 and Their Paths to the Top,"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it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vember 6-7, 2010).

Landry, Pierre,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Landry, Pierre, Deborah Davis and Shiru Wang,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Competition Without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6 (June 2010), pp. 763~790.

Lee, Hong-Yung,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Li, Cheng,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p. 1~30.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8, No. 3 (March 1998), pp. 231~264.

Li, Cheng,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Li, Cheng, "Hu's Policy Shift and the Tuanpai's Coming-of-Ag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5 (July 2005), pp. 8~13.

Li, Lianjian, "Election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Vol. 15, No. 2 (October 2001), pp. 1~19.

Li, Lianjian,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July/August 2003), pp. 648~662.

Li, He, "Returned Stud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Vol. 30, No. 2 (Summer 2006), pp. 1~29.

Li, Lianjian and Kevin O'Brien, "Protest Leadership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3 (March 2008), pp. 1~23.

Lieberthal, Kenneth,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 in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ao China* (California,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30.

Lin, Chialung,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Lin, Yimin and Tian Zhu, "Ownership Restructuring in Chinese State Industry: An Analysis

of Evidence on Initial Organizational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6 (June 2001), pp. 305~341.

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galoni, Beatriz, "Credible Power-Sharing and the Longevity of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 (January 2008), pp. 715~741.

Manion, Melanie,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Manion, Melanie,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4 (December 1996), pp. 736~748.

Manion, Melanie, "How to Assess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in Kevin O'Brien and Zhao Suisheng eds., *Grassroots Elections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21~25.

Mertha, Andrew, *Water Warriors: Citizen Action and Policy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Miller, Ali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Chinese Leadership Politics,"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61~79.

Minns, John, "Of Miracles and Mode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6 (December 2001), pp. 1025~1043.

Nathan, Andrew,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Naughton, Barry,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7).

O'Brien, Kevin,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a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p. 33~59.

O'Brien, Kevin and Lianjiang Li, "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 (June 2000), pp. 465~489.

O'Brien, Kevin, "Neither Transgressive Nor Contained: Boundary-Spanning Contention in China,"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Routlege, 2004), pp. 105~122.

O'Brien, Kevi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O'Brien, Kevin and Rongbin Han, "Path to Democracy? 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0 (June 2009), pp. 359~378.

Oi, Jean,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Oi, Jean and Scott Rozelle,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 (June 2000), pp. 513~539.

Pearson, Margaret, "The Business of Governing Business in China: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Emerging Regulatory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57, No. 2 (January 2005), pp. 296~322.

Perlmutter, Amos,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erry, Elizabeth,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uary 2007), pp. 1~22.

Perry, Elizabeth, "Chinese Conception of Right: From Mencius to Mao and Now,"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 6, No. 1 (March 2008), pp. 137~147.

Saich, Tony,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 eds., *China's Deep Reform: Domestic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285~302.

Salmenkari, Taru, "Searching for a Chinese Civil Society Model," *China Information*, Vol. 22, No. 3 (November 2008), pp. 397~421.

Sartori, Giovann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calpino, Robert,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DC: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Shambaugh, David,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101~111.

Shambaugh, David, "Chinese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 and Efficacy,"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uary 2007), pp. 25~58.

Shambaugh, David,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Shi, Tianjian,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3 (April 1999), pp. 385~412.

Shue, Vivienne, "Global Imagination, The State's Quest for Hegemony, and the Pursuit of Phantom Freedom in China," in Katarina Kinvall and Kristina Jonss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sia* (London: Routlege, 2002), pp. 210~229.

Smyth, Russel, "Should China Be Promoting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 Group,"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4 (April 2000), pp. 721~737.

Solinger, Dorothy, *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Solinger, Dorothy, "The New Crowd of the Dispossessed: The Shift of the Urban Proletariat from Master to Mendicant,"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Routlege, 2004), pp. 50~66.

Tang, Wenfang and William Parish,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Contra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Teiwes, Frederick,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69~82.

Tsai, Kellee,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Tsai, Kellee, "Off Balanc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Fiscal Feder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2 (Fall 2004), pp. 1~26.

Tsai, Wenhsuan and Penghsiang Kuo, "Public Nomination and Direct Election in China: An Adaptive Mechanism for Party Recruitment and Regime Perpetuation," *Asian Survey*, Vol. 52, No. 3 (May/June 2012), pp. 484~503.

Unger, Jonathan and Anita Che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a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5), pp. 29~53.

White, Gordon,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in Robert Benewick and Paul Wingrove eds., *China in the 1990s* (London: MacMillan, 1995), pp. 21~33.

White, Tyrene, "Rural Politics in the 1990s: Rebuilding Grassroots Institutions," *Current History*, Vol. 91, No. 566 (September 1992), pp. 273~277.

Wright, Teresa,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Wu, Yu-Shan, "Away From Socialism: The Asian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9, No. 3 (September 1996), pp. 410~425.

Wu, Yu-Shan and Tsai-Wei Sun, "Four Faces of Vietnamese Communism: Small Countries' Institutional Choice under Hegemon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4 (December 1998), pp. 381~399.

Wu, Yu-Sh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9, No. 1 (June 2003), pp. 93~138.

Wu, Yu-Shan,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Afte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Asian Survey*, Vol. 47,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7), pp. 977~1001.

Yan, Xiaojun, "Regime Inclusion and the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Local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Post-Mao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66 (July 2011), pp. 53~75.

Young, Susan, *Private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Zang, Xiaowei, "University Education, Party Seniority, and Elite Recruit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30, No. 1 (March 2001), pp. 62~75.

Zang, Xiaowei,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Zhang, Weiwei, *Ideology and Economic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 1978-1993*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6).

Zheng, Shipi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